

中共對美政策的研究

姚孟軒

過去二十七年間，中共的美國政策，在前十年是聯蘇反美，一九六〇年與莫斯科分裂後，改爲反蘇又反美，但仍以華盛頓爲主要假想敵，將反美列爲第一優先。這兩個時期加在一起，北平的反美政策，曾持續達二十一年之久，直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才開始有所改變。

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事件，使北平與莫斯科的衝突升高到軍事對峙狀態，蘇聯的軍事壓力不斷增強；在南方，美國參加越戰後也在東南亞集結重兵，中共兩面受敵。而一九六〇年代後期造反外交的失敗，又使北平在國際社會陷於孤立。在內部，毛澤東雖已贏得奪權鬥爭的勝利，但政治情勢仍極混亂，文化革命加諸經濟的嚴重傷害也急待挽救。就在這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時刻，華盛頓改變對北平的政策，向中共伸出援手。毛澤東乃將計就計，同尼克森進行「低盪」，以解除南面的威脅；利用美國牽制蘇聯，以緩和北面的威脅，並防阻這兩個強敵聯手對付中共。毛澤東還想借助美國的影響力，替中共敲開重返國際社會的大門，進而開拓一個對北平有利的國際環境，使他獲得時間和必要的外來援助，解決內部問題。一九七六年八月，耿飈在北平外交學院的祕密講話中曾坦白說出：對兩霸「先捨一取一」，即先聯美反蘇，是「爲了生存」^①。

然而，北平改變對美政策，不僅基於自保，也具有攻擊意圖。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正當一股由「低盪」激起的尼克森旋風，把中共送進聯合國的時候，周恩來向一位英國記者透露中共重返國際社會後的兩項行動計劃，其一是利用美國同蘇聯、日本及西歐的矛盾，從中謀取利益；其二是聯合中小國家，反對超級大國，而主要是反對美國。他又提到喬冠華在二十六屆聯大以反美爲主題的政策性演說，已經擺出北平對重大國際問題的不變立場^②。這仍然是以美國爲第一號敵人。

北平將反美降級至反蘇之下，是在一九七三年，距離毛澤東拋出乒乓球，勾搭上尼克森，已相隔一年多時間。一九七三年四月

註① 「中共對外聯絡部長耿飈就對美關係之講話（摘要）」——「匪情月報」（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發行）第十九卷第七期，一〇六頁。
註② 周恩來同英國記者馬克斯韋爾（N. G. Maxwell）的談話，中共內部文件：「周總理同外國報界人士的談話」。

，中共「昆明文件」^③解釋這一轉變說：對付「美帝」與「蘇修」這兩個主要敵人，應該「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而目前由於來自蘇聯的威脅遠較美國為大，所以要側重反蘇。不過，文件說明北平與華盛頓妥協，除了為突破美蘇兩個戰略包圍，並爭取時間，加速經濟建設和戰爭準備外，還企圖經由和平途徑，誘使美國從亞洲撤退，並將從亞洲撤出的力量轉投入歐洲、中東等地區，與蘇聯爭鬥。文件所提經由和平途徑，使美國退出亞洲的計謀為：(一)通過和平談判，迫使美軍撤離中南半島。文件透露中共接受巴黎協定，是要在越戰中中立美國：「過去越南人民同時對付着美帝和阮文紹，現在美帝滾蛋了，剩下一個阮文紹就好對付了。」(二)利用「尼克森震撼」所引起亞洲國家對美國的懷疑、不滿及中立化傾向，挑撥這些國家疏離華盛頓，同北平拉關係。(三)隨着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改善，挑撥美國與中華民國逐漸疏遠，促使美軍從台灣撤走。此外，文件提到中共另一攻擊意圖，是經由文化交流及訪問活動，向美國人民輸出毛澤東思想，使之與「美國革命運動的實踐結合起來，加速美國革命的進程」。

證諸中共這幾年來的行動，「昆明文件」所記載以退為進的反美計劃，皆已付諸實施，而在越南與中南半島，更已達成預定的計劃目標。

一九七五年五月，喬冠華又依據中共修改後的世界戰略，應用革命邏輯解析對美國政策的轉變說：要使三分天下變成「共產主義的紅天下」，必須改正過去所犯「想一下子把資本主義都打垮，結果把敵人逼在一塊」的錯誤，要講求策略。第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先對付美蘇兩霸。第二，對兩霸也要視形勢變化，區分主次，各個擊破；在當前形勢下則要「穩住西方，連橫抗俄」。這包含聯合美國與西方世界，反對蘇聯，並挑動它們互相火併，以坐收漁人之利。第三，利用「連橫抗俄」造成的混亂局面，避實擊虛，向處於真空地帶的第三世界下手，先將兩霸的外圍據點一個個吃掉^④。證諸中共的行動，它將同美蘇打外圍戰的戰場，限制在非共的第三世界。而在非共的第三世界，有很多美國的外圍據點，却極少蘇聯的外圍據點，北平在這些地區與美蘇爭奪勢力範圍，雖然也把反蘇的調門定在反美之上，並能對蘇聯構成若干傷害，但主要受害人仍是華盛頓，不是莫斯科。「連橫抗俄」在這一方面，也含有聲東擊西的用意。

耿飭的講話，是從中共的看法，解說對華盛頓的政策為何要變，並對新政策的特質作概括說明。耿飭說：美國統治階級有兩面性，有「反動的一面」，也有「軟弱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反動的一面」，強調鬥爭，把華盛頓完全推向敵對的一邊，以對莫斯科同樣的態度對待它，就會使北平陷入腹背受敵，難以應付的局面。故而應該重視並利用白宮「軟弱的一面」，即放下同美國的爭執，在某些方面致力搞好與美國的關係，使中共能夠從「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的夾縫中」解脫出來。但他又說，對山姆大叔「反動的一面」，及其「軟弱的一面」中對北平不利的部份，仍舊要不失時機的繼續與之鬥爭。他的結論是：北平現階段的美國政策，包含

註③ 「昆明文件」係中共昆明軍區一九七三年三、四月間所編限制發至連級的內部教材：「形勢教育參考資料」本文引自該教材第四十一號、第四十二號及第四十三號
註④ 喬冠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對該市及河北省重要幹部的講話——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料室。

「既團結，又鬥爭」兩個方面，團結是「靈活性策略」，鬥爭是「原則性政策」。

可見中共只是將對美國的政策，在策略上作大幅度轉變，由僵硬變為很具彈性，由正面進攻變為迂迴側擊。而反美，以及「埋葬美帝」的基本目標，則並無改變。

二

「既團結，又鬥爭」的兩面政策，是中共在劣勢時期，與強敵周旋所慣用者，在延安時代，曾用來對付國民政府，賴以解脫困境，如今又以同樣政策對付美國。一九三七年，當中共決定採用這一政策的時候，曾說明這樣做是在「分散與緩和敵人的攻擊」，「給革命以休養的時期，積聚力量，並準備新進的條件」^⑤。本此目標，中共從事退却，收拾起反對國民政府的旗號，換上抗日的新裝，還作了一些不損害實質利益的讓步。它承諾實行三民主義，接着又依據它的利益與需要，將三民主義分割為真的和假的、革命的和不革命的，而它要實行的只是真的和革命的三民主義，即符合它的利益與需要的三民主義；對假的和不革命的三民主義，即不符合它的利益與需要的三民主義，則非僅不實行，還要加以反對^⑥。

這樣一來，實行三民主義這個承諾，就變得對中共毫無約束力，中共反而可以利用它的「三民主義」，作為政治及思想戰的武器，來攻擊國民政府與國民黨「反動的一面」。中共又承諾取消它的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並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但在內部文件中却說：這只是換個名義，政權與軍隊的實質並無改變。它決不放棄既得的政治利益，以及對軍隊的控制，即使國民政府要派一個指揮官到共軍中去，它也不會接受。又說：這種讓步及妥協，可以停止國軍的進攻，取得物資、彈藥的供應，及在「全國範圍公開活動的機會」，對它是「有利而無害」^⑦。

中共就用這些有名無實，有利無害的讓步，換得休養生息的時間。在抗戰期間，它扛着「抗日」的招牌，利用國軍與日軍的僵持局面，全力向已成爲權力真空地帶的華北農村地區，建立及擴張武裝割據；這包括利用「抗日游擊戰」，一個個吃掉國軍在敵後的「外圍據點」。在大後方，對政府的宣傳與政治攻擊，是在「抗日」、「民主」兩面旗幟下，隨着軍事力量的增長，由低沉轉趨囂張，但當軍事失利之時，則稍加收斂。這樣不到八年時間，中共已由只剩下的兩萬多殘兵敗將，困守陝北一隅的景況，發展至一百二十一萬黨員，九十一萬軍隊，統治着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的地區^⑧，並從分化敵人營壘，聚合一股中間偏左的政治勢力。對日戰爭結束以後，中共憑仗這支力量，乘瘡痍未復的有利時機，稱兵作亂。兩面政策雖然仍在在使用，惟已由着重聯合，轉變爲着重鬥爭

註⑤ 張浩：「黨的策略路線」，台北薈廬藏書，三八頁。

註⑥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八二——六八七頁。

註⑦ 引自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三冊，一八四、一八五、二二七、二三八頁。

註⑧ 此爲一九四五年五月中共「七大」公佈的數字，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選」第三卷，一〇三九、一〇四四、一〇九五頁。

。一九四九年南京失守前後，更轉變為全面鬥爭，使聯合局部化，後者所指僅限於用「局部和平」方法，向敵人招降。

這些都是衆所周知的史實。重溫這段歷史，對進一步探究中共對美國兩面政策的運用方式及其可能趨向，大有助益。一九七三年十月，中共將抗戰時期的力量轉化論搬了出來，解釋對美國以至整個對外政策的轉變，是爲了推動與美蘇兩霸敵消我長的力量轉化^⑨。毛澤東死後，北平的新當權派又重申此說，表示他們仍將依循此一既定方針，不擬改變。把這個理論應用於當代世界，是將華盛頓當作昔年的重慶，將莫斯科當作東京，並自認如在延安時代，與兩強相較是處在劣勢地位。單就對華盛頓而言，在劣勢地位運用兩面政策，是要全面聯合，使鬥爭局部化，這與一九三〇年代後半期，在同樣力量對比情況下，處理同國民政府關係的作法如出一轍。

三

從一九七一年的乒乓外交到目前爲止，北平的美國政策實際只改了一點，即在華沙會談中堅持先解決原則問題，後解決具體問題，變爲將原則爭端暫時擱置起來，先解決可以解決的具體問題，這就把同美國的關係，由敵對轉向「聯合」。中共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處境，不像三〇年代中期那樣危急，但也對美國作了一些讓步，來「搞好」與華盛頓的關係。最聳人聽聞的讓步，是在「上海公報」中與美國協議依據和平共處原則處理國際爭端，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這使有些人以爲北平已放棄強硬立場，有意在國際社會扮演建設性角色。可是，在這一諾言提出未久，中共又將戰爭區分爲「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類，聲言不使用武力的原則，只適用於「非正義戰爭」，不適用於「正義戰爭」^⑩。它還應用這個戰爭邏輯，把援助北越南侵說成是支持「正義戰爭」，不算違背協議；而美國援助越南抵抗侵略，反被說成是支持「非正義戰爭」，是違背了協議。不使用武力的協議，就這樣變成了中共用來約束美國的工具，它自己則絲毫不受其約束。北平的另一讓步，是在華盛頓駐有中華民國大使館的情況下，同意與美國互設聯絡辦事處。但這種退讓，非僅沒有使實質利益受到損害，反有利於執行「昆明文件」所吐露的漸進計劃，即在逐步改善與美國關係的過程中，離開美國同中華民國的關係。

爲了實現「聯合」，中共還將自己改扮成華盛頓的反蘇夥伴，因應白宮扶中共、抑蘇聯的均勢制衡政策，盡量利用這個共同點，向美國朝野兜售友誼，並拓展貿易及文化關係。反蘇加上貿易，北平已突破禁運法，從美國購進具有戰略價值的高級電腦裝備。而北平能自英國輸入被視作精密軍事裝備的噴射引擎及其製造技術，自西德輸入軍用直升飛機，也必定徵得白宮的同意。一九七六

註⑨ 「霸權主義決定不了世界歷史的命運」——北平「紅旗」雜誌一九七三年第十期。

註⑩ 「新沙皇採取攻勢就埋伏着失敗」——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一日北平新華社記者述評。

註⑪ 喬冠華在第二十七屆聯大的發言——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北平「人民日報」。

年杪，一家英國報紙更透露：中共正認真考慮向西方國家大量採購武器，準備與蘇聯可能的一戰¹²。在學術交流方面，北平也已達成向美國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的初步目標。

從一九七一至七四年，中共與美國的貿易由五百萬美元激增至九億三千三百萬美元，美方並能從巨額出超獲得厚利。惟七五年劇降至四億六千二百萬美元，七六年再降至三億五千六百萬美元。而七五年北平與歐洲共同市場及日本的貿易均告上昇；北平最近又將一筆約五億五千萬美元的小麥生意，照顧澳洲、加拿大和阿根廷，沒有照顧美國，足證與美國貿易的巨降，不完全是經濟因素。在壓縮交易的時間，中共却一再表示，對增進雙方交易極感興趣；它與美國貿易的展望情勢大好，但這種展望大部份將視關係正常化的進程而定¹³。文化交流及訪問活動，一九七二至七三年頗為活躍，隨後則將朝向華盛頓的門戶有時開大一些，有時關緊一些，它拒絕美方某些交換計劃的理由是：這種發展必須等到關係正常化以後。在「搭橋」期間幾乎已完全停止的反美宣傳，這幾年也變為時而緩和，時而激烈。就在這個月初，北平還譏嘲卡特總統維護人權的努力是「假仁假義」¹⁴，並就美國「壟斷資本對勞動人民日益加緊的壓迫和剝削」，作猛烈抨擊¹⁵。不過，即連在反美宣傳激烈的時刻，也要以更激烈的反蘇高音相配合，避免過份刺激白宮。北平報刊對有關美國新聞的處理，則始終依據報憂不報喜的原則，並不隱藏其幸災樂禍的敵意。不管公開態度是溫和還是強硬，它同華府人士的私下對話，都一直擺出願與山姆大叔和平共處的姿態，僅偶而對美國「軟弱的一面」中對它不利的部份，例如對蘇聯的和平政策，提出批評。而它對內說的悄悄話，却仍然是「埋葬美帝」。

時冷時熱，軟硬兼施，這是中共執行兩面政策的慣用手法。這個政策原是由矛盾的兩面所構成，自相矛盾的言論和行動，即在適應這兩面的需要，並用以迷亂對方的認識，進而對對方的決策與行動起導誤作用。一九七四年當北平的態度轉趨強硬，美國有人認為這是由於白宮沒有就和解採取新的步驟，令中共感到失望¹⁶。還有些人把這種矛盾的言行，看成是北平高階層溫和與激進兩派爭鬥的一種反映，每當中共反美的聲調高昂起來，他們又以為激進政策已佔上風，美國應有所行動，協助溫和派扳回優勢。江青事件後，更有人認為和解的主要障礙已經清除¹⁷。

中共首腦部對美政策確有爭論，但只限於爭論，並未嚴重到實際行動上也各行其是；不能把執行兩面政策的正常現象，同黨爭扯在一起。這些錯誤的推斷，正是中共希望見到的反應。假若諸如此類的推斷能以形成輿論，影響決策，北平就可以在今後的政

註¹²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倫敦「衛報」Marin Woolcott 香港報導。

註¹³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紐約「商務日報」。

註¹⁴ 「可笑的人權衛士」——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北平中央電台廣播稿。

註¹⁵ 「西方國家勞動人民的艱難歲月」——同月北平中央電台廣播稿。

註¹⁶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華盛頓郵報」Ross Terrill 專文：「中（共）美關係展望」。

註¹⁷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紐約時報」Allen S. Whiting 專文。

治交易中，以低廉的代價向華盛頓謀取厚利。它的主要目標，是按照它的方案解決所謂台灣問題，實現關係正常化。

四

在國際事務方面，中共對美國兩面政策的運用方式，是在處理與美蘇三角關係，以及與安全休戚相關的問題上，與華盛頓講聯合，實行「連橫抗俄」，但並未完全停止鬥爭。在處理其他國際問題方面，依然着重鬥爭，但行動謹慎而有節制，採取間接方法，盡量避免正面衝突，在某些地區，並使用反蘇的障眼法來遮蓋反美。

對處理與美蘇的三角關係，北平致力加劇兩個巨強間的矛盾，使這另外兩角永遠保持對抗，同時以反蘇急先鋒的姿態投華府之所好，藉以「將自己的安全跟美國束縛得更緊些」^⑱。但對反蘇的實際行動，則總想把美國推到第一線，讓自己站在一邊推波助瀾，並不時對白宮在角鬥中「反動」和「軟弱」的表現提出批評。中共基於戰略上攻擊與防禦的雙重需要，企圖挑起美蘇兩個強敵的長期鬥爭，最好是由冷戰演變成熱戰，使它能獲致類似抗戰時期的有利環境，取得安全的保障和發展力量的機會。因之，它視美蘇和解為應加關注的「頭等大事」，力謀加以破壞^⑲。毛澤東死亡後，北平更加重渲染莫斯科的軍事威脅，指其蓄意「在一場大戰中摧毀美國，從而獨霸世界」^⑳。對三角關係，中共新領導仍舊遵循毛澤東的既定政策，未作改變。

歐洲對中共的安全有重大關連，中共因而在這一地區跟華盛頓講聯合，支持美國留在那裏，同西歐合力對抗莫斯科，使歐洲長期保持緊張的冷戰狀態，把蘇聯困在西線，無法將力量轉移到亞洲來對付中共。不僅如此。北平視歐洲為美蘇爭霸的主戰場，「昆明文件」所提挑動兩強「狗咬狗」的搏鬥，即將歐洲列為首一目標地區。近半年來，更強調蘇聯正從陸上和海上步步進逼西歐，戰爭威脅在「危險地增加」，它隨時可點燃火藥，而要燒的不單是西歐，還有美國。從而要西方拋棄和解幻想，加強防務，做好同莫斯科打仗的準備^㉑。北平又強調美蘇爭霸是歐洲禍亂的根源，其向西歐推銷反霸，在反蘇的高音中也摻合一些反美的小唱，並沒有把反美忘掉。

對日本，中共也是基於安全的需要，才改變對日美安保條約的反對態度，放下反美，集中目標反蘇，把離間日蘇關係、使日本成為反蘇的夥伴作為當前第一要務。然而，它不會長時期容忍東鄰有個同美國結盟的強國，只承認日本「目前」還需要華盛頓核子傘的保護，而在它看來，這個「目前」要維持多久，應根據北平的利益和需要，不是根據東京的利益和需要來決定。北平將美蘇同

註⑱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Benjamin Welles 華府特稿。

同①。

註⑲ 「為什麼歐洲容易起火」——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北平新華社記者述評。

註⑳ 同②及「新沙皇處處逼西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北平新華社記者述評；「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爭奪的戰略重點在歐洲」——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北平中央電台時事講話。

列爲「兩霸」，它堅持在與東京的和約中列入反霸條款，現在看來是針對莫斯科，但一旦形勢有了變化，也可以把攻擊箭頭轉過來對準華盛頓。廖承志不久前就明白告訴日本總評主席木加真枝，中共要反的帝國主義與霸權國家，是將蘇聯及美國兩個都包括在內，而非單指其中任何一個。

亞太地區對中共的安全極具重要性，也必須跟美國講聯合，但它已擁有發言地位，可以將反美的聲音放大一些，不必作太多的忍讓。因之，兩面政策在這一地區的運用，與西歐、日本不同，鬥爭的一面所佔比重要來得大些。在亞太地區，它是以全面聯合穩住華盛頓，替它阻擋莫斯科，自己則積極從事準備，伺機選擇美國的某一「外圍據點」，作重點突破。而當一個戰役勝利結束後，就按照「休戰原則」^②，以笑臉代替拳頭，用來軟化美國，並謀取準備下一個戰役所需要的整補時間。

當開始跟白宮「低盪」的時候，北平私下表示願意和平解決越南問題，並希望美國作爲一個安定力量留在亞洲，不要馬上撤走。但它實際執行的却是「昆明文件」所載另一完全相反的計劃，即支持北越先用和平方法讓「美帝滾蛋」，然後使用武力奪取越南。中南半島的變色，使華盛頓大爲惱怒。然而，正當人們醒悟過來，拿出塵封已久的骨牌理論，探索下一張骨牌落在那裏之際，中共又奏起和平曲調，說不願見美國再從亞洲撤退，同意朝鮮半島的戰爭可能而且應該避免，想使華府的激動情緒再鬆弛下去。但它實際在做的却不是妥協，而是喬冠華「天津講話」提出的準備攻擊。對韓國，戰爭的四項準備工作，即增強戰力，使韓國「不打自亂」，誘迫美國撤退軍事力量，試探日本的態度，都在積極進行之中。對東南亞，則是以推展正常外交，大力支援各國共黨的武裝叛亂雙管齊下，加速這一地區的革命進程。喬冠華還提到對東南亞共黨的支援，包括供應金錢與槍砲，以及反對「帝修的殘酷鎮壓」，即不讓美國和蘇聯介入。中共爲此又致力挑撥東南亞國家同美蘇的關係，向它們輸出反霸，鼓動它們擺脫外來的干涉及控制，要「前門拒狼（美國）」，同時提防「後門進虎（蘇聯）」^③。

受北越侵吞越南後轉而傾向蘇聯的教訓，中共對支援亞太地區的共黨已懷有戒心。喬冠華講話透露毛澤東援助北韓的條件，是平壤不僅「反帝」，還要「反修」。但基本政策並無改變，一個多月前，北平還聲言支持北韓「統一祖國的正義鬥爭」，及其圖謀使韓國「不打自亂」的統戰攻勢，並要求美國軍隊撤離韓國^④。東南亞共黨的叛亂活動，在中南半島三國淪亡後業已加強，這些國家不得不撥出巨款購買武器，應付日漸增大的顛覆威脅^⑤，在紅禍爲害甚烈的泰國，更有人担心會變成另一個越南^⑥，中共正在廣事挖掘，想從其中找尋出另一張可以傾倒的骨牌。

註② 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選」第二卷，七四四頁。

註③ 「革命與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回顧一九七五年國際形勢」——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④ 「正義的主張，合理的方案」——一九七七年二月五日北平「人民日報」社論。

註⑤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日本時報」George Mc Arthur 新加坡報導。

註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香港虎報」Brral de Silve 曼谷報導。

對與安全無多大關連的地區和問題，中共仍然跟美國唱反調，但也同時反蘇，甚至將反蘇放在反美之上。在中東，北平的政策是反對和平，助長戰亂，與華府針鋒相對，並指摘美國的和平政策是維持不戰不和局面，藉此排斥蘇聯，謀求擴張，莫斯科亦復如此^①。其最終目標據喬冠華講話所透露，是煽動以阿長期戰爭，把美蘇兩國也捲進去，使它們打得兩敗俱傷，最後讓「革命風暴趕走美帝和蘇修的侵略勢力」，打出個「人民的中東」。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共的口號是「驅狼防虎」，即驅逐美國勢力，防阻蘇聯乘虛而入，在動亂頻仍的南部非洲，中共在爭奪安哥拉失敗後立即撤退，將抵抗莫斯科的重担加在華盛頓的肩上，自己站在一旁指責兩霸的「反動」，並鼓動南部非洲人民「拿起暴力革命這把鐵掃帚，把種族主義、殖民主義統統掃進歷史的垃圾箱」^②。對國際經濟問題，北平這幾年來一直在對能源危機，火上加油，要第三世界的窮國以資源為武器，鬥爭富國，它要鬥的主要是美國與西方世界，而不是蘇聯。在這一類地區和問題上，北平對華盛頓只講鬥爭，不講聯合。不過，中共只能算是亞洲的地區性權力，它在亞洲以外不具影響力的地區搞反美，尚不足對美國的利益構成不能容忍的傷害；而它的反蘇，則使美國多少能得到點好處。因之，就整體言，這種局部性鬥爭，還不致破壞全面聯合，影響整個對美國政策的推行。

五

中共對美國改採這個兩面政策，迄今為止，已在不背棄原則，不損害實質利益前提下，做到「分散與緩和敵人的攻擊」，贏得「給革命以休養的時期」。但這些成就，皆屬防禦方面。在攻擊方面，僅在東南亞地區有相當進展，惟其所獲果實大半已為蘇聯所奪取。而東協國家之改變立場，加強軍事與安全合作^③，也為中共的謀求進一步增添阻難。北平要與華府為敵，看來似乎太不自量力，不過，兩面政策乃一借力政策，其得失成敗取決於能否利用敵人的矛盾、弱點及疏忽，以敵制敵，而不是取決於物質力量的強弱。放眼今日世界，從美國本身以至整個國際社會，確實存在着不少的問題，使中共有可借之力，是以對之不宜過於低估。

毛澤東死後，北平新當權派一再聲明不改變毛的對外政策，這當然包括對美政策在內。兩個多月前，中共又在了一篇闡述毛、周外交政策的文章中，重申周恩來在「四屆人大」的聲明，願在認真執行「上海公報各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改善同美國的關係^④。這已明白表示，它目前的對美政策，是毛澤東的既定政策，也是周恩來的既定政策。不過，這篇文章描述的周恩來，是個忠於共產主義、堅持原則及善用謀略的鷹派，不是如有些人所想像的溫和的鴿派。是以它所執行的周恩來政策，是個有原則、有謀略的政策，即兩面政策，而不是有些人所想像的溫和的政策，即只有聯合、沒有鬥爭的一面政策。

註① 「爭霸與反霸」——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六日北平中央電台「時事講話」。

註② 同①及中共代表賴亞力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聯大的發言。

註③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日本時報」Colin Bricker馬尼拉路透社電。

註④ 中共外交部理論學習組：「學習周總理的光輝 樣，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而奮鬥」——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

北平新當權派雖願繼續改善與華盛頓的關係，惟作爲「基礎」的「上海公報」，如中共所說，是個「獨特的國際文件」，由列述雙方原則性分歧及若干協議所組成。所有原則性分歧，至今皆原封未動擱在那裏，無一獲得解決。季辛吉曾透露與中共談判的情況說：「我們以不同的標準來談判，我們談讓步，他們談原則，我們強調安全，他們相信鬥爭。」^③這已道出雙方的原則性分歧，根源於意識形態、國家目標及由此所產生價值判斷的差異。這種分歧，非僅無法協調，也無法擱置。事實上，在過去五年間，原則爭端仍在影響雙方關係，並未真正擱置起來。退一步分析，即使原則爭端能够擱置，也無法在貌合神離的基礎上，建立良好的關係。再就已獲得的協議言，北平對不使用武力的協議已另作解釋，對不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的協議，也只是用來約束美國、對付蘇聯，它自己也未遵守。由此可知，以「上海公報」爲基礎改善關係，其真實含義，只是要華府順從它的意志，再作讓步。

註③ 引自Allen. S. Whiting:「美國與中共關係下一步怎樣發展？」——美國外交政策協會一九七六年四月出版。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匪情研究叢書」：

- | | |
|------------------------|-----|
| 一、共匪政治問題論集 | 五十元 |
| 二、共匪軍事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三、毛共反儒尊法運動析論 | 四十元 |
| 四、匪黨內部門爭問題論集 | 六十元 |
| 五、「十大」後之中共 | 五十元 |
| 六、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七、共匪經濟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八、大陸知識份子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九、匪黨問題論集 | 四十元 |
| 十、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探源 | 廿五元 |
| 十一、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 | 四十元 |
| 十二、中共的文藝整風 | 六十元 |
| 十三、共匪文字改革總批判 | 四十元 |
| 十四、中共問題論集 | 四十元 |